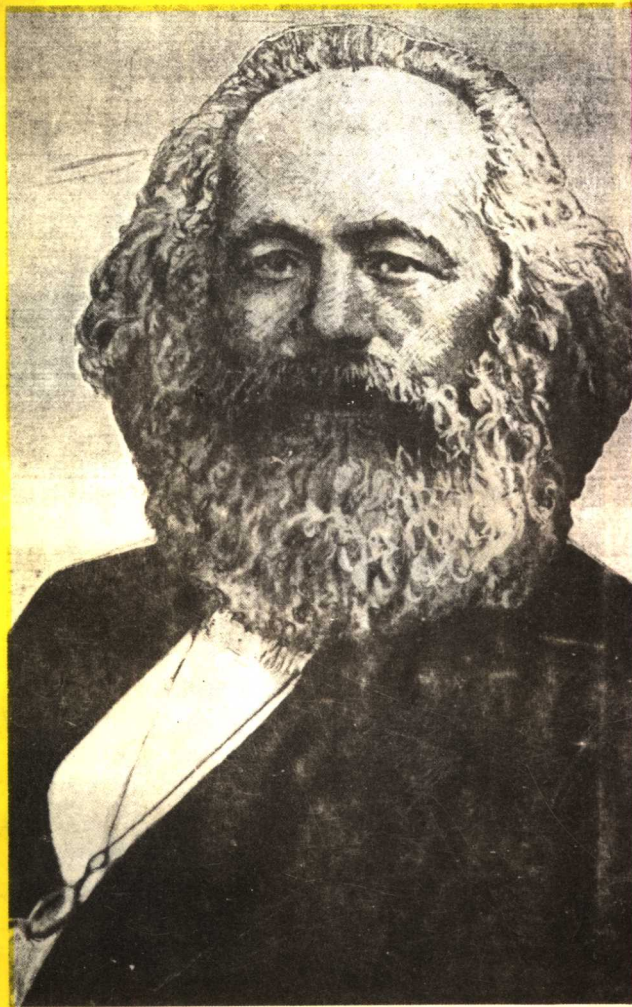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

发展

吴晓明 著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

发展

吴晓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A811.63
36

(滇)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卢云昆 海 男

封面设计: 徐 芸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

吴晓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00 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2-01160-9/B·80 定价: 5.90元

目 录

导言：当代争论与方法问题	(1)
§ 1 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争论	(1)
§ 2 马恩早期著作的当代发现	(15)
§ 3 方法问题	(31)
第一章 “自我意识”和“思有同一”	(56)
§ 1 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56)
§ 1—1 康德：先验主体。“纯粹活动”。二 元论	(57)
§ 1—2 费希特：自我。“活动本身”。形式 的思辨推理	(63)
§ 1—3 谢林：思有同一。“无限的活动”。 理智直观	(69)
§ 1—4 黑格尔：实体即主体。“自我活动”。 辩证法	(74)
§ 2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实体”与“自我意识”	(81)
§ 2—1 黑格尔哲学之为宗教的理性支柱	(81)
§ 2—2 大卫·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	(88)
§ 3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意义	(94)
§ 3—1 最初的转折与矛盾之点	(95)
§ 3—2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一	

般的说明·····	(104)
§ 3—3 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肯定意见。比较 具体的说明·····	(114)
§ 3—4 对于伊壁鸠鲁哲学的批评意见。比较 具体的说明·····	(121)
第二章 “现实的人”和“市民社会” ·····	(127)
§ 1 《莱茵报》时期的社会—政治批判·····	(128)
§ 1—1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倾向·····	(129)
§ 1—2 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意味着什么·····	(144)
§ 1—3 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问题·····	(162)
§ 2 费尔巴哈哲学人本主义的意义·····	(175)
§ 2—1 宗教人本学和哲学人本主义·····	(177)
§ 2—2 感性—对象性·····	(187)
§ 2—3 “现实的人”的概念及其意义·····	(193)
§ 3 《德法年鉴》时期的哲学批判·····	(202)
§ 3—1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共同立场·····	(204)
§ 3—2 对象性的反思形式·····	(213)
§ 3—3 “本质的矛盾”和“市民社会”·····	(226)
§ 3—4 “市民社会”的解剖及其理论格局·····	(238)
第三章 “异化劳动”和“对象性的活动” ·····	(255)
§ 1 异化劳动学说：政治经济学批判·····	(259)
§ 1—1 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的二律背反·····	(262)
§ 1—2 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267)
§ 1—3 异化劳动学说的展开及其理论意义·····	(276)
§ 2 共产主义学说：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286)
§ 2—1 自我异化和异化的扬弃·····	(293)
§ 2—2 共产主义观念的诸形态·····	(305)

§ 3 哲学：“对象性活动”原则。劳动……………(324)

§ 3—1 “对象性活动”概念的初步意义……………(325)

§ 3—2 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336)

§ 3—3 劳动。“对象性活动”原则的进一步
意义……………(346)

第四章 实践原则与唯物主义历史观 ……………(358)

§ 1 新世界观的哲学唯物主义纲领……………(360)

§ 1—1 “感性的活动”或“客观的活动”……………(362)

§ 1—2 现存感性世界。意识或观念……………(371)

§ 1—3 马克思的实践原则在哲学世界观上所
实现的变革……………(382)

§ 2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草创与初拟……………(392)

§ 2—1 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历史的“现实
的前提”……………(394)

§ 2—2 人类历史与共产主义……………(403)

导言：当代争论与方法问题

§ 1 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争论

恐怕没有一种哲学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历史产生过如此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如此广泛而持久的争论。这种影响和争论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如果说讨论的主题毕竟随着情况的改变而不断更迭，那么马克思的哲学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却始终在争论中不断浮现，成为当代思想之关注的重点和争论的中心。

最能表现此种特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任何一种探讨，几乎都无法完全撇开马克思的“幽灵”；这种情况使得所谓“人文科学”各分支的代表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有意于评价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几乎任何一种有影响的当代学说的出现，都伴随着它的“马克思主义”的衍生物：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如此等等。

在马克思逝世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们还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在海格特公墓被埋葬了。然而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似乎变得时髦了。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敌、马克思

主义的“职业批评家”，也无法否认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性。当《资本论》第三卷出版的时候，威·桑巴特得出结论说，“我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即将结束，而是刚刚开始”。^① 时隔8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L·海尔布隆纳在他的《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1980）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令人时刻感到惊悸的精灵，是激起人们最热切的希望和恐惧、使人产生种种大相径庭的见解的根源”。^②

这种强烈的感受决不是个别现象。即使在西方，即使是一些在当代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也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这个深厚的背景（无论这种背景对他们具有怎样的意义）。1933年，卢卡奇（G·Lukács）在国际作家大会上作了题为《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的发言，他说：“与马克思的关系，对每一个认真对待自己世界观的阐明，认真对待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当前的形势、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对它的态度的知识分子说来，都是真正的试金石。他对待这个问题的认真、彻底和深刻的程度，是衡量他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回避……对当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采取明确态度的尺度”。^③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思想经历也许更有意义。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告诉我们说，当他二十岁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大学里还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的讲座。许多相信共产主义的学生不敢引证马克思主义，甚至在论文中不敢提及马

① 参看尼·伊·拉宾：《论西方对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第7—8页（所引版本等均在最后的参考文献中注出，脚注中不再一一指明。以下同。）

② 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第1页。

③ 《卢卡奇自传》，第210页

克思主义的名称，因为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的考试失败。当时害怕辩证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黑格尔对他们来说，也是十分陌生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没有黑格尔的传统，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教师，也没有思想工具，因此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萨特读了《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他说，他明明白白地都读懂了，但又绝对地一点也没懂。萨特写道：“可是这种阅读却没有把我改变。相反，开始把我改变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即巍然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工人群众，这个巨大的阴郁的团体，在体验和实行马克思主义，它远远地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挥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当上升阶级意识到它自己的时候，这种觉醒也远远地影响了知识分子，而且分化了他们头脑中的观念。”^①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知识界的这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决不意味着在这个主题上的立场协调或观点一致；恰恰相反，它倒是意味着社会-历史问题在成为当代思想所关注的中心时，如何不可避免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向这一哲学提出要求和呼吁，还是提出追问和挑战；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想界愈益成为对立的枢轴和争论的焦点——人们可以赞成它或者反对它，但却不可能回避它或者抹煞它。

就理论方面而言，对立汇集在两种立场上。其一是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第二国际的一部分理论家就曾依照“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唯物主义”的主题去解释历史唯物主义；虽则这一立场受到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拒斥，但却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而受到维护和攻击。新康德主义者卡

^①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15、16页。

西尔 (E. Cassirer) 断言, 马克思就像弗洛伊德之推重“里比多冲动”一样地崇拜“经济本能”; 赖辛巴赫 (H. Reichenbach) 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由“经济史观”引申出来的经济决定论; 而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 (R. G. Collingwood) 则认定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一部单一的历史, 即经济史, 因而象征着一种“反历史的自然主义”。^①

与此对立的是所谓人本主义或批判主义的立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立场是特别属于本世纪的 (尽管它在某种渊源上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 并且特别地与当代人本主义的思潮相联系。卢卡奇和柯尔施 (K. Korsch) 几乎同时对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科学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发起攻势,^② 把马克思主义主要地描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的历史哲学; 布洛赫 (E. Bloch) 根据“希望”这样一种本体论现象来确定马克思学说的意义, 并在六、七十年代倡导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 而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地规定为与传统理论相对立的“社会批判理论”。

这样两种对立的理解决似乎把历史唯物主义分裂为两种相反的原则立场, 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似乎从中间“爆裂”了。这种情况首先表现为第二国际理论家与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妥协。其结果是, 理论本身——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基础——被忽视了, 甚至被混淆了。这种忽视严重到什么程度, 可以从下面这段话中看出来:

弗·梅林 (他是德国党内最有哲学修养、也是最多讨论一

① 参看卡西尔:《人论》,第28页;赖辛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第60页;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第139—140页。

②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同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皆发表于1923年。

般哲学问题的理论家)说,马赫(E·March)完全不想做哲学家,他只愿意局限在自己所内行的科学范围内。“在这方面,马赫完全与马克思相一致,完全撇开哲学,而只在历史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实践工作中考察人类的精神进步。”他又说,“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①

不难想象,正是这种对于理论本身、对于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误解和忽视,使得他们不时地回到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那里(尽管他们也时而不关痛痒地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同它们妥协;他们把思想、意识、观念和意识形态简单地并且直接地还原为经济事实,却又不得不连连退却。正是这些矛盾和动摇,使得他们不是从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去透彻地理解问题的实质,而是在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上,附加各种各样的“均轮”和“本轮”,也就是说,附加各种各样的“保留”、“退却”和“补充说明”;或者,在“唯物主义”这个词的前面,附加各种定语,如“辩证的”、“能动的”等等。②

这种“附加”在世界观方面的薄弱,在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直接。

按照梅林的意见,机械唯物主义在今天仍然是合理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不过否定了它在历史范围中的权利,而根本没

① 参看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60—161页,第156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② 这诚然是“不错”的(按黑格尔的说法),因为它至少表明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并不是旧唯物主义。但是,他们否定地说出的东西,并不表明他们也能肯定地说出真理。这里的要害正在于“附加”(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这一点可在以下的讨论中看出。

有否定它在自然科学范围中的权利。因此，“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在另一处梅林又补充说，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唯物主义隔离开来或对立起来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它们应当并存，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补充”，而这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_{代表}就是费尔巴哈。^①

根据这种看法，马克思是历史领域中的真理，而费尔巴哈则是自然领域中的真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而只需指出：梅林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局限于历史领域，恰恰只能为机械唯物主义在_{世界观方面}“留出地盘”。这样一来，似乎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基础作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立足点，似乎恩格斯对机械唯物主义的_{全部批判}、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_{十一条论纲}仅仅是牵扯到“专业范围”或“学科领域”的问题了。

与梅林的上述见解相类似，普列汉诺夫在他1915年的著作中，把拉美特利、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统统归到“斯宾诺莎的类”，断言他们的唯物主义实则是相同的；并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哲学本身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与费尔巴哈相同的观点，而马克思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认识论。^②因此，尽管普列汉诺夫一再重申方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甚至援引黑格尔的说法——方法是体系的“灵魂”，但却仍然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作是与其唯物主义基础本质上无关的东西；把费尔巴哈之未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偶

① 参看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99、146页

②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78、779—780页

然的、方法上的失误，而与其唯物主义基础无关。

基于同样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把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同马克思的“实践”原则混为一谈。他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提纲》^①误解了费尔巴哈；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批判活动”，这是不对的，因为费尔巴哈是了解它的。^②然而，普列汉诺夫恰恰没有（进而言之，依其立场也不可能）理解，尽管费尔巴哈可以和马克思同样经常地使用“实践”一词，但其意义在哲学世界观方面却是非常不同的；此外，就费尔巴哈来说，这个概念对于理论原则乃是疏远的和偶然的，真正说来并不具有世界观高度上的重要性。^③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加详尽的讨论，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这里只需指出一点，即：普列汉诺夫之所以以为马克思误解了费尔巴哈，只是由于他自己的误解——对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误解，对“新世界观”的实践原理的误解。

这种误解和混淆立即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倒退和失误。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理论乃是在唯心主义的攻势下向实证主义求救，^④那么他关于法国史学家丹纳（H·A·Taine）的意见同样表明了这种无原则的妥协。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马克思所说的事情几乎与丹纳所说的一

① 指马克思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②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末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章加以详细的讨论。

④ 参看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第110—111、195页；并参看《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6、7节。

模一样，只是用的字句有一点不同；因此，用稍稍不同的字句把丹纳的公式^①改变一下就得出了马克思的“公式”。^②姑且撇开这个“公式”本身（它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毕竟还是不错的）不论，普列汉诺夫难道不是试图在某种意义上把实证主义的东西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者，把一种本质上是实证主义的美学引入马克思的理论吗？^③

在这样一些基本观点上的妥协和动摇说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这个基础中去，而各种即使是出自良好意愿的“附加”又正好说明了这个基础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已经得到真正理解的东西。因此，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们也往往只是诉诸于实证主义的或庸俗的唯物主义。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

“普列汉诺夫批判康德主义（以及一般不可知论）多半是从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而很少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因为他只是不痛不痒地驳斥他们的议论，……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二十世纪初）批判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多半是根据费尔巴哈的观点（和根据毕希纳的观点），而很少根据黑格尔的观点。”^④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由于庸俗唯物主义不可能在这个时代真正有效地同唯心主义作战，所以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尽管只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179页。

② 参看同上书，第167—187页，特别是第185—187页。

③ 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这种实证主义的美学观点，可参看里夫希茨的批评意见（里夫希茨：《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此外，在考察社会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考茨基也总是诉诸于人和动物所共有的那个“社会本能”（social instinct），并且往往用生物学的规律来界说人类社会或为人类社会的现象提供确证，使之成为最终依据。关于这一点的批评意见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32页。

④ 列宁：《哲学笔记》，第190—191页。

是隐约地，但却同样不可避免地显露出他们同唯心主义妥协的迹象。因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动的”、“革命的”唯物主义，而且既然我们的理论家没有（或不可能）在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来说明这种能动性和革命的方面，那么，为庸俗唯物主义留出地盘也就直接意味着为发展了能动方面的唯心主义留出了地盘。例如，在梅林看来，叔本华之所以成为统治阶级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是因为他用“意志”向机械唯物主义宣布了不妥协的战争。但是，叔本华“并不能长久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不只是他们的第一位时髦哲学家，他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伟大哲学家。”^①同样，在说明“革命意志”的时候（而且是在题为《康德和马克思》的论文中），梅林根本就无意于谈论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见解，而仅只引用“无产阶级的子弟”费希特。^②在其他一些同类主题的论文中，他给予“唯心主义者”拉萨尔（作为费希特的继承者）以同样无批判的颂扬。

毫无疑问，叔本华的“明亮闪光”以及费希特的哲学功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这些“闪光”或功绩是不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确定了位置？也许在谈论革命意志时，梅林不过是想用包含在马克思世界观中的“费希特因素”（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来加以说明，但是，这个“因素”难道可能同费尔巴哈的基础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理解吗？

在理论上倾向于实证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的理论家所让渡出来的地盘，很快便为另一种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占据。1923年，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开始全面地反驳

^①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第90页，重点号为笔者所加。

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柯尔施的看法，第二国际的领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用进化论、科学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等等抹杀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功能，否定了无产阶级在实际斗争中的主体作用，否定了真正的社会革命。^①

然而，在哲学理论方面，柯尔施的这些反驳意见与其说是克服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实证主义倾向，毋宁说仅只是与之相对立。在柯尔施看来，作为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哲学，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这种见解十分明显地把批判的、实践的社会革命理论同这一理论的科学要求对立起来。因此，尽管柯尔施在后来的《卡尔·马克思》（1938）一书中改变了看法，但就其为“批判理论”奠定基础的那种倾向而言，则是力图排除乃至否定马克思学说中的“经验社会科学性质的因素”。^②

与柯尔施的观点较为接近的卢卡奇，同样十分坚决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正统’”。在1957年的《我在斯大林时期》一文中，卢卡奇写道，“1929—1930年的哲学讨论曾使我希望能够弄清黑格尔和马克思、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马克思和列宁的关系，即从所谓普列汉诺夫的正统下解放出来，并为哲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境界”。^③

虽然卢卡奇一直以为他是在三十年代才意识到“与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相对立”的，然而真正说来，典型的对立恰恰是从《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始的。当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一味强调经

① 参看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英文版，第52—67页。

② 参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译文集》，第3、5页。

③ 《卢卡奇自传》，第225页。

济决定论，并且以一种纯粹自然的方式来理解经济作用的模式时，“《历史和阶级意识》企图为真正行动解除世界的必然性”。^①因此，这部著作否定任何“自然辩证法”，并且立即以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方式，将“总体性”在方法论上的核心地位与经济的优先性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方式的根本区别，并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性（totality）的观点”。^②

正像卢卡奇本人后来所指证的那样，《历史和阶级意识》企图用以“解除世界的必然性”的所谓“行动”，实际上正意味着一种“极左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这部著作虽然认识到马克思是一位全面的思想家，但却是“透过黑格尔的眼镜”来观察马克思的，还只是以黑格尔为基础“把黑格尔和马克思在一种‘历史哲学’中加以综合”。因此，卢卡奇在他的自传中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回避了的问题”，但它对阶级意识的分析包含着明显的“唯心主义成分”；正是由于这一点，并且由于它的激进主义所代表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所以它受到了“资产阶级读者”的广泛而持久的欢迎。^③

因此，如果以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方向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成功地克服或纠正第二国际的理论倾向，那么这种想法即使不是偏见，也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正如卢卡奇在去世前最后一次会见报刊记者时（1970年）所说的那样：“在二十年代，柯尔施、葛兰西和我曾企图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第二国际流传下来的社会必然性和对它的机械解释的问

① 《卢卡奇自传》，第40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英文本，第27页。

③ 参看《卢卡奇自传》，第212—214、39、118—119、241页。